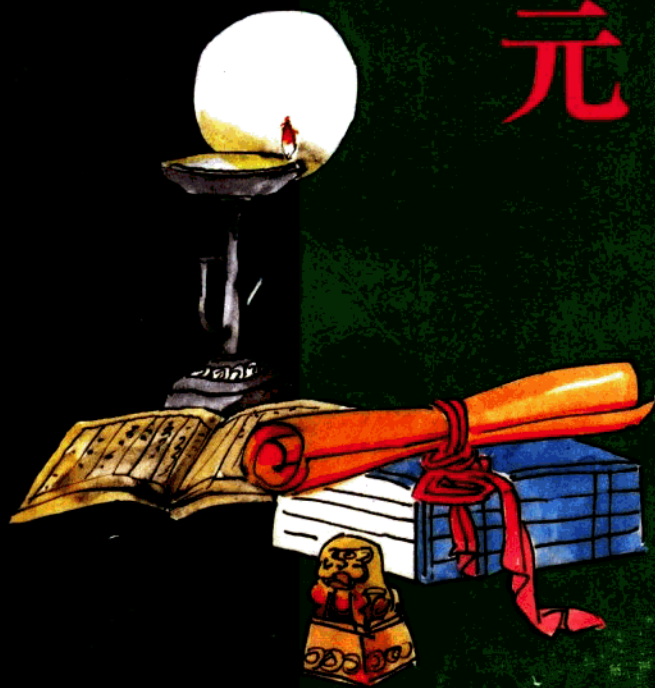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州状元

QUYU RENQUN WENHUA CONGSHU

苏州状元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区域人群文化丛书

苏州状元

胡敏 著

丛书主编 邹逸麟 / 副主编 王振忠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苏州状元

SUZHOU ZHUANGYUAN

胡敏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 59 号)

福州方盛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

福州荣利达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4.75 印张 2 插页 96 千字

1996 年 8 月第 1 版

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000

ISBN 7-211-02714-2

G·1854 定价:5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

丛书总序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历史上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、变化和扩散是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。不同区域的文化、经济背景,孕育了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。中国幅员辽阔,各地自然条件纷繁复杂,风俗习尚也丰富多彩。早在先秦时期,中国人就对各地的人文现象给予了特殊的关注。《礼记·王制》篇曾指出:“广谷大川异制,民生其间者异俗。”在数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,世代环境的熏陶和文化传统的规范,造就了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各地人群。尤其到了明清时期,随着社会动荡,人口压力的进一步增大,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,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都有了相当大的变化,生计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各地区人群的首要问题,救荒也就成了整个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。17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:

重农固为务本,但今人稠地窄处,竟有无田可耕,因其土俗,各有力食之路,便非游手,此亦救荒源头。(《祁彪佳集·救荒小考》)

这是对治生手段的一种崭新的认识。显然,各地区的芸芸众生,都“因其土俗”,开拓自己的“力食之路”。经过数代的家传户习,不同区域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传统,也就塑造出各地不同的人群性格,并逐渐成为纵向遗传和横向衍播的民俗传承。

于是，在浙东的会稽山麓、镜湖之滨，涌出了大批砚田笔耕、游幕四方的绍兴师爷；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，则孕育出呼朋引类、席丰履厚的徽州朝奉；晋中盆地的祁、太一带，出现了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商；来自白山黑水间女真后裔，入主中原大地后，形成了一批靠铁杆庄稼为生的八旗子弟；……这些闻名遐迩、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区域人群，在近数百年来，曾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中国人素有“沾着乡土的心理”，对桑梓乡土的眷念，总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文化天性。不同区域的人群成员在移居他乡时，都竭力保持某些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、饮食习惯和其他的社会风俗习尚。这往往会给侨寓地深深地打上区域人群的性格烙印，程度不同地引起整个社会风尚的变迁。

鉴于以往学者多注重于对中国人整体作宏观性的探讨，但对“区域人群”作系统的区域性的文化透视，则迄今未见。因此，我们推出这套丛书，意在加强这方面的探讨，以期对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研究有进一步的认识。基于以上认识，本丛书选择历史上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区域特征的人群，加以文化透视，力图透过对区域乡土背景、各地人群的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的把握，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。我们衷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大力支持，也盼望有更多的研究论著加入本丛书的行列。

编者

1994年3月

目 录

丛书总序	(1)
引 言	(1)
一 谶语背后的期盼	(4)
(一) 穹窿石移 潮至夷亭	(4)
(二) 从“轻死易发”到“习儒尚礼”	(6)
二 状元:苏州土宜	(12)
(一) “今年状元仍在苏州”	(12)
(二) 连中三元 四元唱和	(18)
(三) 郡甲天下之郡	(22)
(四) 艺文之运的关照	(32)
三 书香绵延 前映后照	(42)
(一) 科甲世家	(42)
(二) 状元家族	(50)
(三) 父少尚书子状元	(52)
(四) 家庭传习与师友渊源	(57)

四 学而优则仕	(63)
(一) 天子门生	(63)
(二) 清贵翰林	(68)
(三) 衡文:视学与典试.....	(72)
(四) 柔性政治家	(76)
五 富贵人生 锦绣还乡	(89)
(一) 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	(89)
(二) 状元坊·状元居·状元桥	(99)
(三) 居乡美俗.....	(106)
六 吴风吴俗:主天下之雅俗	(116)
(一) “忆我前年入国门,连珂接珮多乡 人”	(116)
(二) “多少北京人,乱学姑苏语”	(124)
结 语.....	(134)
附 录 明清苏州状元.....	(142)
主要参考文献.....	(144)

引 言

一方的风土人文往往会使这一方人士为之自豪不已。有两则故事反映了苏州人的自豪。

清初，一日，在京的各地官僚相集，各自聊起自己家乡的土产，言之者娓娓，听之者津津，热闹非凡。唯有苏州长洲人汪琬（字钝翁）高坐一旁，一言不发。众人轮番讲过后，意犹未尽，便一定要汪琬说说苏州的特产。汪琬淡淡地说，苏州的特产“绝少”，只有“二物”。众人忙问是哪二物？汪琬道：“一为梨园子弟。”众人抚掌称是，急问另一物是什么。汪琬欲言又止，在众人的催问下，徐徐答曰：“状元也。”众人初一愣，随后“结舌而散”。汪琬表面上谦逊，骨子里自傲，其底蕴和结论便是状元是苏州的土产，而众人“结舌而散”，却表现了众人的自惭形秽及对汪琬之言的默认。

汪琬是含蓄的。在另一场合的谈话中，有一苏州人大概有点过分夸耀于苏州之出状元了，座中有一人便出冷语相讥：“苏州出状元，就如河间出太监，绍兴出惰民，江西出剃头师，句容出剔脚匠，物以类聚，无足怪也。”以太监、惰民之类来比状元，倍加奚落刻薄，却对“苏州出状元”一说未加否认，而是给以“物以类聚”的解释。

不管是默认，还是奚落，上述两则故事都反映出“苏州出状元”已成为当时人之共识，这当然是由于明清时期，尤其是

清代，苏州地区状元辈出而给人造成的印象。据进士题名碑录统计，明清两代共出状元 203 名，苏州地区有 34 人，其中清代有状元 114 人，苏州籍状元 27 名，约占四分之一。

状元，亦称“状头”，或只称“第一人”。名称唐代即有，但由于设置科目不一，考试内容有别，选拔程序不同，唐代的状元与后世的状元不尽相同。唐代进士之选每年举行，地方各州向中央贡送的举子在应试前，先向礼部递呈州里的解状及各举子出身、履历等亲状，称为“投状”。录取后，礼部又把这些新进士的身分材料及成绩一起报送皇帝，称为“奏状”，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状头。北宋以后，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，尤其是皇帝殿试策问成为定制，赴京会试第一名只称“会元”（宋时称“省元”），殿试第一名才可称“状元”。由此，状元的声名、身价、地位一下子高拔许多，更显出不同一般的意义。故不便将唐与宋明清的状元相提并论，混而言之。

奚落归奚落，状元毕竟是不能与剃头师、剔脚匠同日而语的。在传统社会中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读书——科考，成为文士的普遍选择和人们心目中的正途，而位于科考巅峰的状元，更是为人们仰慕，“公卿以下无不耸观，虽至尊亦注目”，荣耀无比，身价百倍。但是，攀登巅峰者众，成功者少，所谓“邑聚千数百童生，拔十数人为生员，省聚万数千生员，拔百数十人为举人，天下聚数千举人，拔百数十人为进士”（梁启超《饮冰室文集》卷 3《各省举人上皇帝书》），状元则是三百进士的榜首。考之再考，拔之再拔，“一朝成名”的背后又何止是“十年寒窗”的艰辛。状元，“这是地球各国，只有独一无二之中国方始有的，而且积三年出一个，要累代阴功积德，一生见色不

乱，京中人情熟透，文章颂扬得体，方才合配。这叫做群仙领袖，天子门生，一种富贵聪明，那苏东坡、李太白还要退避三舍，何况英国的培根、法国的卢骚呢？”这是清末民初的曾朴在《孽海花》中所说的一段话，不乏调侃意味，然也可看作为后世人对状元身分地位的认识。家族、社会的因素，个人的品行、才学、机遇，等等，种种因素综合，才造就成非同寻常的状元。状元的稀罕难得与身价地位，决定了其成为传统中国中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特殊的群体。

可以说，状元在传统社会中是一种稀贵资源，它被苏州人引以为地域的特产，且为世人所公认。这块土地何以能孕育众多的状元，作为苏州科举文化兴盛的象征和“多尚儒学”的苏州文人的精英，“苏州盛出状元”这一独特的区域社会文化现象，值得深入解析。

一 讖语背后的期盼

苏州，位于太湖流域下游，处江、湖、海之间，临江面海，枕江倚湖，为春秋吴国故地的一部分，历史上曾有“吴中”、“吴郡”、“吴下”之称，宋时称“平江”。明、清两代，苏州府大致包括吴县（元和）、长洲、吴江（震泽）、昆山（新阳）、常熟（昭文）及太仓州，其地域范围及行政区划基本沿袭至今。

隋唐时，兼有江湖之利、陆海之饶的苏州迅速发展，成为巨郡都会。至宋代，吴中英才蔚起，人文甲于东南，于是，开始流传两句有关苏州文运的讖语。

（一） 穹窿石移 潮至夷亭

南宋初年，苏州民间流传着两句讖语：一句为“穹窿石移，状元来归”，另一句是“潮至夷亭出状元”。穹窿指位于太湖边的穹窿山，是“吴中山最高远处”，被时人推为吴郡名山第一山。穹窿山石自移，当是不可思议的自然景象。夷亭（即今唯亭），在昆山县西 35 里处，传说春秋时吴王阖闾带兵抵御东夷犯境，曾在此安营建亭，由此得名。当时，昆山虽近江海，但很少出现过潮汐。穹窿石移，潮至夷亭，人们似信未信，但城里城外，男女老少都有心无心地传说着这一有关状元之出的讖语。

宋代实行文官治国，严格科考立法，扩大取士名额，这无

疑给了读书人更多的机会，取中的进士较隋唐成倍地增长。北宋160余年，苏州“井邑之富，过于唐世”，“冠盖之多，人物之盛，为东南冠”（朱长文《吴郡图经续记·城邑》），但状元始终与苏州人无缘。苏州人曾为“吴郡自隋唐设进士科以来，未尝有魁天下者”而遗憾再三。宋室南渡，偏安东南一隅的政治格局给了东南各地文士千载难逢的机遇，苏州文人的科考夺魁，该是水到渠成了。

宋孝宗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，一夕忽闻穹窿山中风雨大作，第二天清早，人们发现穹窿山半山腰的一块巨石，从东移至西，“屹立如植”，石块移动所经之处，杂草偃伏，似受过碾压。这年科考，吴县人黄由高中榜头，成为苏州第一位状元，终于圆了苏州人的状元梦。

说来，该年科考与时势极为相关。当时，宋金交战，战事对宋不利，宋孝宗因此耿耿于怀，常以“坚忍”二字安慰自勉。辛丑科廷试时，宋孝宗见一份对策试卷起句为“天下未尝有难成之事，人君不可无坚忍之心”，大合心意，遂将这份试卷定为第一，这正是吴县人黄由的对策卷。黄由大魁天下的消息传到苏州，苏州上下轰动，当时的平江府知府韩彦质特在黄由所居住的醋库巷立状元坊，以表其闾。这是苏州的第一个状元坊，之后形成惯例，凡有人考中状元，苏州地方官便在其所居之地立状元坊，以旌表状元，激励乡民子弟。

穹窿石移之谶得到了应验，而传唱“潮至夷亭出状元”的声音却日渐稀落了。早在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年），曾有潮水涌过昆山县城郭，但没有出状元，人们开始怀疑起谶语的灵验了。淳熙十一年（1184年），即黄由中状元后的第三年，有一

道士云游到昆山，复诵此谶，下言定有邑人应此谶，正巧为侍御李彦平所闻，便告知昆山县令叶自强。叶自强于是在水滨建闻潮馆，满含期才之望。是年，潮水果然涌过夷亭，而科考放榜，高居榜首的果然是苏州昆山人卫泾，一时成为乡中伟观，天下奇事。

科考三年一举，黄由与卫泾分别于淳熙八年、淳熙十一年高中状元，一时造成苏州人连捷的事实与声名。至于谶语在民间的广泛流传，往往隐含着人们的普遍愿望，反映着人们的群体意识与观念。穹窿石移，潮至夷亭，传唱遍苏州的四乡八邻，道出了这块土地正在发生的社会风习与时代崇尚的变化——这一变化直接造就了以后数百年姑苏文盛、科甲兴旺的社会氛围。

（二）从“轻死易发”到“习儒尚礼”

苏州人爱把自己的文化之源追溯到春秋吴国，所谓“泰伯导仁风，仲雍扬其波”，南奔荆蛮、建立“句吴”的泰伯、仲雍被认作苏州文化重文好道的发端者，而孔子的南方弟子言偃则被奉为文学礼仪之先贤，被誉为“文开吴会，道启东南”。方言、民歌、民俗、文学、绘画等文化现象，都冠以“吴”字以区别于他域文化。人们在观念上和情感上都将吴国文化视为源头，苏州文化灿烂的历史及动人的魅力由此而始，由此而发，这也正是后世苏州文化昌盛的深厚底蕴。

然而，在社会风习上，吴国人却表现出与后世苏州人大相径庭的内容。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依软语、温文尔雅的苏州人

的祖先却是好勇习武之辈。吴国人居住在三江五湖的水乡泽国之中，从居住、耕种、渔猎到相互间往来、交流，都与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是个“陆事寡而水事众”的部族。三江五湖往往“动作若惊骇，声音若雷霆，波涛援而起，船失不能救，不知命之所成”，稍一疏忽或力怯，就会樯倾楫摧，葬身鱼腹。生活其间，既需要机智、敏捷，更需要力量与勇气。春秋战国时代，整个社会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。正是这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，培育了吴国人好勇尚武的性格与风尚。“轻死易发”，“好相攻击”。与此相应，吴国不乏专诸、要离之类的勇士侠客，更有“文治邦国，武定天下”的伍子胥，被奉为兵家鼻祖的孙武之类的将帅，为吴国的崛起与辉煌而出将入相，尽显才华。当时，吴国还以其精良的青铜兵器而显名列国，连屈原《国殇》中也有“操吴戈兮披犀甲”之句，而干将、莫邪所铸宝剑更是闻名至今。勇士、良将、宝剑，这块土地弥漫着浓烈的尚勇习武之风。

吴国人的轻死易发与当时好儒备礼的中原文化格格不入，中原人因之将其视为夷蛮之国。然而，孔子却别有一种论断，他言道：“南者生育之乡，北者杀伐之域。故君子执中以为本，务生以为基，故其音温和而居中，以象生育之气，忧哀悲痛之感，不加乎心，暴厉淫荒之动，不在乎体。夫然者，生存之风，安乐之为也。”齐国伐鲁，孔子为救“父母之国”，曾派弟子子贡使齐，并“南说”吴王、越王，故而，吴国当属于孔子所说的“南者”之乡。不过，吴人的轻死、好斗却似乎与孔子所说的生存之风、安乐之为并不相符，但后世苏州地区风俗的变化却印证了孔子的论断。

秦汉以后，吴地的尚武古风继续延续，“吴会轻悍”难治，

曾令汉代统治者忧虑重重。至西晋，左思作《吴都赋》，仍有“士有陷坚之锐，俗有节概之风”的描写，整个六朝时期，苏州地区都盛行果决、好战之风。隋平陈以后，风气“颇变”，人们在行为方式上“率渐于礼”，但其主流仍为尚武之风，从习战讲武到斗力之戏，人们依旧乐此不疲。至宋代，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扭转，尚礼淳朴之风取代了尚武之风，连盛行于民间的五月斗力之戏也不复再有，地区个性变得“柔慧”。宋以后，苏州地区普遍地习柔尚让，据方志风俗卷载：“今吴民大率柔慧，或遇上慢下暴，往往容隐弗之较焉。”尚文之风日浓，官宦士大夫等诗礼之家促其子弟读书应举以延续书香门第，一些富贵之家也纷纷以读书习文来荣耀门楣，甚至不惜重金购求世儒之家的家谱进而冒附；而且平康百姓之家，即使只有几亩瘠田，也勉力让子孙入泮求学，“家家礼乐，人人诗书”。

世风嬗变，很大程度上是由苏州地区区域环境的改善促成的。而自然环境的改善，实际上直接取决于对水的控制程度。太湖流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开始于三国时代，当时，整个江南地区都进入了规模性的开发、治理阶段。从这时起，堤、塘、堰、坝等水利工程大量兴修，太湖流域险恶的水情状况开始有了改观，由“水势弥漫，流亦湍急”变为“水稍平减，流渐宽缓”。到隋唐时期，在太湖上游的苕溪、若溪、荆溪修筑了狄塘、五堰和一些蓄水湖，节制和分散了太湖的来水，从而使整个太湖水势从根本上变缓。五代吴越国继续调整水系，尤其是在下游“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，或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”，疏通下泄水道，初步完成了太湖完整的圩田制和水利系统。之后，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对太湖尤其是下游河道的不断疏浚、开通，太

湖流域的河流湖泊为患的频率、程度大大降低,险恶山水变为柔美清丽的山水。水情改变后,造物主为苏州人提供的生存环境更显优越性:兼有“三江五湖之利”、“川泽沃衍,有陆海之饶”,物产丰富,水源充足,土壤肥沃,气候温润,这些都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福泽,即使在火耕水耨的极原始的生产方式下也能食物常足,无饥馑之患,这无疑是大自然的一种恩赐。

从社会环境看,唐宋以来,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,农田水利的大规模兴修,苏州地区的人口和耕地激增,社会经济迅速兴盛繁荣,富足安乐,被视为人间天堂,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,妇孺皆知。在这个天堂中,还有令他域人羡慕的安宁、稳定。苏州偏于江南一域,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、西北,因而也远离了政治、军事冲突的核心。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,激荡不起足以影响其长久安宁、稳定的波澜,无烽火之警,少逃亡之艰。据宋代龚明之《中吴纪闻》载:“盖自长庆以来更七代三百年,吴人老死不见兵革。”为享有三百年的承平而欣欣然。宋以后,这个地区虽然也遭受过一些兵火侵扰,但安稳是其社会的总趋势。

大概最晚不迟于宋代,自然的整治开发,经济的富庶,社会的稳定,促成了苏州地区平和、富足、稳定的生活体系的形成。与此相应,人们在行为方式、生存方式上,锐利之势、勇武之气日减,而日趋安乐、温和,从而在社会风尚上,发生了由刚及柔、由武至文的根本转变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也逐渐形成“乃若见吴人而择其礼让之风,遇楚人而增其骚怨之思”的概念。

一方风土,一方人文。苏州地区社会风尚的文武之替,使这块土地孕育的人才类型也发生转向,“当赵宋时,俗益不变,

有胡安定、范文正之遗风焉；及后，礼义渐摩，而前辈名德，以身率先，又皆以文章振动；今后生文词，动师古昔，而不桎于专经之陋，矜名节，重清议，下至布衣韦带之士，皆能摘章染墨。”工文词而薄骑射，以致文人学士、硕儒名宦代不乏人，彬彬而出；勇士名将却寥寥无几，甚至于武科岁试只得插罗充数，及额而止，这与士人争相磨濯举业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。清末的冯桂芬，这位苏州出的榜眼曾针对苏州的文、武人才的不平衡言道：“吾吴古多文学士，而羽林、期门、欽飞之选，或代不一人，文武才尤罕。虽范文正胸有甲兵，而西事未尽愜于论者。越在有明，惟韩襄毅号知兵，余无闻矣。”（《冯桂芬集》卷6）可见，苏州多“斗将战士”的声名已渐为“因士类显名于历代”的盛誉所淹没。

风尚嬗变，人才转型，在苏州地区人文演变发展史上，宋代无疑是一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。这一时期的苏州人以前人绝无可能有的心态关注着区域的人文发展，对于家乡文士的建功立业开始抱有越来越高的期望值。大魁天下，成为苏州文人为之孜孜以求的目标，也成为文物之盛已冠东南的苏州人新的期盼。

苏州人的期盼并非一厢情愿。隋唐科考初创之时，科举优势为黄河中下游地区——这块当时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最发达的“核心地区”所垄断。在安史之乱及唐末五代的战乱中，黄河中下游一带战火纷飞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残。士人为避战祸，纷纷南迁，避居江淮。生活习俗、读书风尚，中原文明由此而挟裹南来。此消彼长，北方人对科举的垄断地位日渐丧失。北宋年间，南方士人几次夺魁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